
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定量研究的传承与嬗变^{*}

贺 平 黄 贝

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的定量研究相继经历了初创、发展、成熟、深化等四个时期，与之相对应的四个世代梯度特征显著，各自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和经典作品，其核心研究主题和理论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一传承和嬗变背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在演进逻辑与方法论变迁、日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生态、学者的个人偏好与群体特征构成了三个关键性影响因素，但在各个阶段的权重表现有所不同。“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支点机构和团队的示范作用、国际化的双向交流以及学会和刊物等制度载体，成为定量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支撑。虽然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在定量研究上并未经历激烈的“大辩论”和激进的“方法论革命”，但其持续的阶段性反思以及平衡“本土特色”与“国际主流”的努力仍不乏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国际关系学 定量研究 方法论 学科史 学术史

作者简介：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黄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09；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5)05-0128-2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创新体系下的世界现当代史梳理与研究”（编号：2025JZDZ043）；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年度项目“中日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战略博弈与行为竞合”。

自20世纪50年代发轫始，美国学界主导推动的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浪潮逐渐席卷社会科学诸学科。在国际关系领域，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成果数量骤增、影响力显著提升。时至今日，在大部分主流英文学术期刊上，定量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研究早已超越“半壁江山”。^① 然而，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学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多侧重于定性方法，而且相比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定量研究似更显羸弱。这一印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随着时间推移，后者是否有所变化，又体现出哪些特点？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定量研究方法论褒贬不一。^②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争鸣，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日益关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非西方国家，其学界对于定量研究的优劣得失、适用范围等议题，均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③ 因此，本文无意从方法论层面再次讨论定量研究方法的原理及特征，而拟聚焦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定量研究的历史现实，借由文献回溯和资料整理，考察其发展脉络和现状特征，以透视战后日本学术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有助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为了尽可能涵盖日本国际关系学界以数理知识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较为宽泛的“定量研究”定义，不仅包括以统计分析为工具、以检验因果规律为目的的实证研究，还涉及博弈论、计算机模拟、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④ 据此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在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界，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其“定量转向”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学术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新一代日本定量研究者的表现已与国际同行相当，其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和占比持续增加。^⑤

当前，对日本政治学发展史的研究大致采取三种路径：一是以学者个人为焦点，主要以传记和口述史的形式出现；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学科内的重要争论；三是以数据为支撑，从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的视角呈现

^①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37–464.

^② 小林良彰「日本における政治学の意義と方法（下）—日本政治学会会員への調査結果を中心にして」、『UP』第30卷第7号、2001年、19—21頁。

^③ 参见：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松原望・飯田敬輔編『国際政治の数理・計量分析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鈴木基史・飯田敬輔編『国際関係研究の方法—解説と実践—』、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

^④ 也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并不包括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参见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2—13页；庞珣、漆海霞：《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年发展与进路》，《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1期，第4—5页。

^⑤ Masaru Nishikawa, Daisuke Sakai and Akira Matsui,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Publishing in Two Languages: The Case of Japan, 1971–2023”, *Scientometrics*, Vol. 129, No. 11, 2024, pp. 6975–7003.

和阐释学术发展的动态变化。^① 三种路径各有所长，但不无交叉整合的可能。但是，与政治学领域相比，无论是在英文和日文学界，还是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系统梳理仍显匮乏。^② 而且，尽管日本学术信息数据库（CiNii）和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成系统（J-STAGE）等学术数据库的覆盖范围和回溯能力显著增强，但仍有不少文献未被系统收录或久未得到关注。为此，本文拟对这一领域开展基础性整饬：以学者世代传承的纵向发展为主线，首先回顾战后至今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阶段性变化，突出文献挖掘的功效，进而从学科史和学术史视角下的横向对比出发，考察其整体的演化脉络和借鉴意义。

一、初创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尝试与摸索

早在二战之前，日本便已出现具有学科雏形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1924 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创建了“政治学政治史第二讲座”，实为国际政治学。1932 年，早稻田大学正式开设“国际政治论”课程。^③ 但与大部分国家类似，日本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国际关系视作广义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内容及方法的研讨，也往往被置于政治学的框架下。^④

二战后，日本国际关系领域的定量研究经历了稳步发展、不断积累的渐进过程。^⑤ 二宫三郎将战后初期近 20 年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划分为“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国际政治史”三大系列，分别由出身于政治学、经济

① 待鳥聰史「戦後日本の政治学は何に関心を示してきたのか—日本政治学会パネル名称のテキスト分析による試論一」、『法学論叢』第 193 卷第 5 号、2023 年、97—118 頁。

② 贺平：《日本学者的政治学研究：国际化进程与反思》，《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34—145 页。

③ 对于战前和战后初期日本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初步梳理，参见：川田侃・二宮三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発達」、『国際政治』第 9 号、1959 年、119—128 頁。

④ 蟹山政道・堀豊彦・岡義武・中村哲・辻清明・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政治学の過去と将来」、『日本政治學會年報政治學』第 1 卷、1950 年、35—82 頁。

⑤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就有“国际政治科学”的提法，但主要指基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严格的现实主义立场”，与重视制度和法律的“理想主义”相对。这与如今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科学”并不相同。参见：春名展生「国際政治学の生物学的基礎—神川彦松の忘れられた一面—」、『国際政治』第 148 号、2007 年、89—90 頁。神川彦松于 1950 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同样以较大篇幅阐述了“国际政治科学”，意指更为精确的“国际政治学”。参见：神川彦松『国際政治學概論』、勁草書房、1950 年、3—16 頁。

学、历史学的学者担当研究主力。其中，“国际政治学”根据方法论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权力政治论学派”“行为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国际关系论”则强调“综合方法”。不难看出，“行为论学派”与“国际关系论”等均与定量研究方法有所关联。^①

随着1957年苏联成功研制并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苏的太空竞赛和战略博弈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态势也迅速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设置、研究焦点和方法论取向。同年，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运用博弈论构建起国际政治理论模型。由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围绕科学行为主义展开论战，而日本学界在第一时间便获悉这一动态。^②

初创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学者以关宽治（1927—1997年）^③、武者小路公秀（1929—2022年）^④等为代表。田口富久治将石田雄、篠原一、松下圭一等日本政治学者称为“20世纪20年代世代”。^⑤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领域，或许同样可以如此命名。初创期的学者，其求学经历适逢二战时期，因而多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其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依靠跨学科背景或短期海外交流习得。例如，关宽治在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国际政治之前，毕业于理学部物理学专业，具备专业的数理基础；武者小路公秀则是从学习院大学法学部毕业后，作为旁听生前往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并在普林斯顿

^① 二宮三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動向」、『国際政治』第25号、1964年、115—124頁。

^② 長井信一「アメリカ国際政治学の方法論的系譜—シューマンを中心として—」、『国際政治』第9号、1959年、14—29頁。

^③ 参见：関寛治「一九一七年ハルビン革命—ハルビン・ソヴェト樹立をめぐる国際政治学的一考察—」、『国際法外交雑誌』第57卷第3号、1959年；関寛治「国際政治学における数学的方法—ゲーム理論を中心として—」、『国際政治』第9号、1959年、58—89頁；関寛治「アジアをめぐる国際体系の変動—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に関する中間報告—」、『年報政治学』第20卷、1969年、181—239頁；関寛治『国際体系論の基礎』、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関寛治「国際体系における貿易と通信—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による研究—」、『国際政治』第42号、1970年、68—81頁；関寛治「国際関係における数学的分析の歴史と展望」、『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経営の科学』第24卷第8号、1979年、454—461頁。

^④ 参见：武者小路公秀『国際政治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武者小路公秀「政治の言葉と緊張緩和—帝国議会における首相演説の価値内容分析—」、『年報政治学』第20卷、1969年、145—180頁；武者小路公秀「政策決定研究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組織科学』第3卷第2号、1969年、35—44頁；武者小路公秀『行動科学と国際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武者小路公秀「政治学と行動計量学」、『数理科学』第12卷第2号、1974年、27—33頁。

^⑤ 田口富久治『戦後日本政治学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开展访问研究。

二战后，日本迅速重回国际舞台。在日美特殊关系的作用下，美国的影响渗透至日本各领域。因此，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式”定量研究方法的关注与应用起步颇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日本学者介入行为主义这一国际关系方法论的讨论，几乎与欧美同步。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关宽治就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性文章，阐释博奕论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特别是如何运用博奕论模型分析外交决策过程。在引介之外，他还开展自主的专题研究，构建了国际政治决策的模拟模型。1973 年关宽治担任日本和平学会首任会长，在“和平研究”中倡导规范与模型一体、价值追求与数学方法相融。^①

这一时期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除了关宽治、武者小路公秀等极少数学者之外，日本学界仍处在尝试和摸索的阶段，但对“定量方法”的整体态度是相对积极的。神川彦松（1889—1988 年）、蜡山政道（1895—1980 年）、信夫淳平（1871—1962 年）等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开拓者均不以定量研究见长。^② 战后初期执掌学界之牛耳的资深学者也绝大部分出身于传统的外交史和政治史领域。但是，或许是得益于历史实证主义的熏陶，彼时不少中坚学者对定量方法持一种乐见其成的开放态度。由于当时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机会有限，他们在参加世界政治学大会、国际政治学会圆桌会议等大型活动后往往撰写学术报道，及时将行为主义革命等欧美学界的前沿动态介绍到日本国内。战后日本政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南原繁和蜡山政道、行政学代表学者辻清明和吉富重夫，以及从事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和政党史实证研究的升味准之辅等知名学者，均有过类似经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对政策决定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科学化”理论的运用频率骤增。在冷战高潮期一系列突发事件的背景下，运用“社会工程学”等“科学的方法”探索国际危机管控条件成为不少人的期待。^③ 为此，日本东海大学自 1965 年 11 月起出版《行为科学研究》杂志（2002 年停刊）。20 世纪 60 年代，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日本主要大学纷

① 对于关宽治的学术梳理，参见：杉浦功一「関寛治—日本の平和研究の制度化ー」、初瀬龍平・戸田真紀子・松田哲・市川ひろみ編『国際関係論の生成と展開—日本の先達との対話ー』、ナカニシヤ出版、2017 年、193—205 頁。

② 二宮三郎「日本の国際政治学の開拓者たち」、『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 27 卷第 1 号、1992 年、46—62 頁。

③ 関寛治「国際政治学の新しい胎動—電子計算機導入にともなう国際体系論の再編成ー」、『国際政治』第 25 号、1964 年、98—114 頁。

纷建立校内计算中心，1969年更设立了全国共同利用大型计算中心的制度。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为定量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技术便利。此外，日本还借鉴美国经验推动自身智库建设，于1971年成立了“未来工学研究所”。^①

在更宽泛的社会科学领域，高根正昭的《创造的方法学》、竹内启的《社会科学中的数与量》等“原论”影响深远，至今仍被频频引用。^②同时，坂本义和、永井阳之助、高畠通敏、高柳先男等知名学者也对行为科学方法表现出兴趣。^③因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外交等议题的定量研究，日本学者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付诸实践。不少学者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研究者，却颇为敏锐地知晓了定量研究方法，并在自身的传统研究中有所尝试。例如，卫藤沈吉（1923—2007年）、冈部达味（1932年—）等学者在从事中国政治外交史研究时，有意识地借用了模拟实验和内容分析等行为科学主义的方法；从事中国外交和东南亚研究的松本三郎（1931—2009年）等学者也在其列。^④

第二，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起步之初就得益于跨学科的交流。不同学科的学者非但没有明显的门第观念，反而积极携手，不乏集体合作的成果。^⑤形成这种氛围的一个背景在于，战后初期堪称日本的“统计鼎盛期”，数理统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刑满释放追踪考察、市场调查、国民性格分析、医疗诊断等领域。这些研究虽然侧重国内问题，但无疑使社会科学从业者对于定量方法的接触度和接受度不断提高。^⑥林知己夫（1918—2002年）等日本数理统计学者及其创建和改进的方法，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

① 小柳義夫「大学計算センター事始め」、2019年、[https://www.hpcwire.jp/\[2025-06-15\]](https://www.hpcwire.jp/[2025-06-15])。

② 参见：竹内启『社会科学における数と量』、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高根正昭『創造の方法学』、講談社、1979年。

③ 初瀬龍平「総論」、初瀬龍平・戸田真紀子・松田哲・市川ひろみ編『国際関係論の生成と展開—日本の先達との対話一』、ナカニシヤ出版、2017年、9頁。

④ 参见：岡部達味「内容分析による中共对外政策の研究」、『アジア研究』第10卷第4号、1964年、28—58頁；衛藤瀧吉・岡部達味「中華人民共和国対日発言の内容分析：1958年2つの時期における人民日报を材料として」、『外務省調査月報』第6卷第1号、1965年、1—17頁；岡部達味『現代中国の对外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松本三郎「国連における日本の投票態度—各ブロックとの同調度の統計から一』、『国際政治』第24号、1964年、67—81頁。

⑤ 細谷千博・綿貫讓治編『对外政策決定過程の日米比較』、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⑥ 参见：高橋正樹編『科学史と科学者—林知己夫氏公開インタビュー—』、『行動計量学』第31卷第2号、2004年、107—124頁；森本栄一「戦後日本の統計学の発達—数量化理論の形成から定着へ—」、『行動計量学』第32卷第1号、2005年、45—67頁。

术支持。^①此外，经济学家铃木光男（1928—2022年）、社会心理学家田中靖政（1931—2006年）、政治学家山川雄巳（1932—2002年）和白鸟令（1937年—）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深入参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开拓。例如，铃木光男在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期间就与武者小路公秀相识，回国后积极参加永井阳之助等一众国际关系学者组织的研究会，突破当时“博弈论等同于军事战略研究”的偏见，利用自身专长分析国际体系三极结构、同盟关系、中立问题等，并投身东南亚社会调查分析，推出了诸多相关成果。^②

第三，定量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均重点突出。首先，在主题上，定量研究集中于战争与和平等少数重大议题。这既是时代之问，更是源于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深刻反思。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初创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平学研究者。^③恰恰也是这些和平学研究者，在接触和尝试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其价值和功效作了先行反思。^④其次，从方法来看，正如大岳秀夫所言，当时的政治学尚未具备固定的理论方法，因此从其他领域借鉴方法以分析作为“现象”的政治，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色彩。^⑤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国际关系学同样如此。而从具体方法看，博弈论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基于文本材料、民意调查等数据，博弈论、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等方法也便于被“嫁接”到传统的政治外交史和国际政治过程分析中。

第四，对外来方法和视角的引进，往往离不开译介的先导作用，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也不例外。日本学界素有重视翻译的传统，在战后又迅即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由于受众有限、专业难度高等原因，西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译介在速度、广度上都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优秀

① 林知己夫他編『計量的研究—我が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の最近の動向—』、南窓社、1974年。

② 参见：铃木光男『ゲーム理論と共に生き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年、219—222页；铃木光男「三極構造の論理」、『季刊芸術』第5卷第4号、1971年、78—87页；铃木光男「国際関係における中立の可能性」、『季刊芸術』第7卷第1号、1973年、54—70页；铃木光男編『競争社会のゲーム理論』、勁草書房、1970年。

③ 这一特点甚至延续到第二个世代，参见：日本平和学会編集委員会編『平和学の数量的方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白鳥令「私は何故 S&G 研究に携わ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か？ 関寛治教授・平和研究・政治・価値・モデル・コンピュータ」、『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ミング』第28卷第2号、2018年、80—89页。

④ 関寛治・中村研一「方法論シンポジウムにおける争点の諸形態—その内的連関について—」、『平和研究』第1卷、1976年、52—77页。

⑤ 大嶽秀夫『戦後政治と政治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ii页。

成果仍较早被日本学界引进并翻译。^①除了成册的译著之外，不少作品还以译文或编译的形式出现，刊登于各类期刊和文集中。^②关宽治、武者小路公秀等中青年学者亲身参与译介，对其自身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此外，大量源自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基础学科经典著作的译介也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③

要言之，在战后初期的近 20 年中，日本学界对于定量方法逐渐“接近”。^④ 政治学研究应否以及如何实现“科学化”已经在日本引起了讨论，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也慢慢受到关注。^⑤ 此时，定量研究方法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刚刚起步，虽有极具示范效应的少数领军人物及其研究成果出现，但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越南战争和日本大学学生运动爆发等背景下，日本主流知识界对行为科学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性并不推崇。^⑥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研究中，除了把价值作为分析对象并突出学术研究自身的价值前提之外，还具有重视历史取向、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等特征。^⑦ 其二，多数日本国际关系研究者仍然强调对外交文献的史料分析，对数据形式的实证研究素材接受度不高。^⑧ 其三，长期的文理分科造成大部分日本学者缺乏定量研究训练；同时，对于日本的政治学者而言，还存在着“政治主义的分析者、政治运动的指导

^① 参见：シエリング・ハルペリン共著『戦略と軍備管理』、防衛研修所、研究資料第 16 号、1963 年；A. ラバポート『現代の戦争と平和の理論』、関寛治編訳、岩波書店、1969 年；K. E. ボールディング『紛争の一般理論』、内田忠夫・衛藤瀧吉訳、ダイヤモンド社、1971 年；J. C. チャ尔斯ワース編『現代政治分析』、田中靖政・武者小路公秀編訳、岩波書店、1971 年；A. ラバポート『戦略と良心』、坂本義和・関寛治・湯浅義正訳、岩波書店、1972 年；M. A. ウインスタイン『行動科学派の政治理論』、吉村正監訳、東海大学出版会、1973 年。

^② 参见：デビット・シンガー「国際関係論研究に対する行動科学の貢献」、武者小路公秀編訳、宍戸寿雄ほか『社会科学における計量的方法』、学習研究社、1971 年、127—152 頁。

^③ トマス・クーン『科学革命の構造』、中山茂訳、みすず書房、1971 年。

^④ 北川敏男「解説 人文社会科学における計量的接近」、宍戸寿雄ほか『社会科学における計量的方法』、9—26 頁。

^⑤ 参见：白鳥令『政治発展論』、東洋経済新報社、1968 年；白鳥令編『数量政治分析』、ペリカン社、1971 年；田口富久治・佐々木一郎・加茂利男『政治の科学—現代的課題と方法—』、あゆみ出版社、1972 年（改訂新版、青木書店、1973 年）；花井等『現代国際関係論』、ミネルヴァ書房、1974 年。

^⑥ 田中明彦：《日本国际政治学：超越“分居”》，载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刘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 页。

^⑦ 石田雄『増補新装版 日本の社会科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年、183—187 頁。

^⑧ 田中明彦：《日本国际政治学：超越“分居”》，载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刘星译，第 14—15 页。

者、日常政治的解说者”等身份的诱惑甚至干扰，使其难以潜心于严密的学术研究。^①这些因素使得定量研究方法在日本学界远未如美国般盛行，也不足以掀起与欧美相似的学术争论。

二、发展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奠基与承继

经过初创期的铺垫，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的定量研究以涓涓细流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学者不再停留于对西方舶来方法的引介和综述，而是纷纷运用这些方法开展专题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海归学者”成为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主力。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战后留学西方的日本学者陆续学成归国，并将在外习得的方法论带回国内。这些学者大多在国内完成本科或硕士阶段学习，后至欧美知名大学获得政治学或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回国后极力加强推介欧美学界研究方法的广度和深度，为培养下一代定量研究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②因此，尽管美国“行为主义革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告一段落^③，但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定量研究仍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

山本吉宣（1943—2023年）、猪口孝（1944—2024年）、药师寺泰藏（1944年—）^④、黑川修司（1949年—）^⑤等学者是这一世代的代表。其中，

① 京極純一『政治意識の分析』、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296—297頁。

② 这一时期的海归学者，包括猪口孝（麻省理工学院，1974年）、山本吉宣（密歇根大学，1974年）、药师寺泰藏（麻省理工学院，1975年）、佐藤英夫（芝加哥大学，1976年）、高木诚一郎（斯坦福大学，1977年）、田中明彦（麻省理工学院，1981年）、猪口邦子（耶鲁大学，1982年）、山影进（麻省理工学院，1982年）等。

③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4, 1969, pp. 1051—1061.

④ 参见：药师寺泰藏・山本吉宣・藤田修一「制度変革の計量的分析—1つの方法論の提案—」、『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経営の科学』第24卷第8号、1979年、471—478頁；药师寺泰藏「ダーリーハルサーニー型パワーモデルによる日米通商関係の動学的分析—昭和四二年から五二年までの日本の対米カラーテレビおよび乗用車の輸出を例に—」、『国際法外交雑誌』第79卷第3号、1980年、229—273頁；榎原英資・药师寺泰藏『社会科学における理論と現実—実証分析における一つの試論—』、日本経済新聞社、1981年。

⑤ 参见：黑川修司「紛争の計量分析（上）」、『一橋研究』第28号、1974年、53—70頁；黑川修司「国際紛争の計量モデル試論」、『一橋研究』第75卷第6号、1976年、705—711頁；黑川修司「軍備拡大競争の数学モデル」、『平和研究』第3卷、1978年、128—142頁；黑川修司「軍拡競争の理論的考察—計量分析を中心にして—」、『国際政治』第63号、1979年、138—155頁。

山本吉宣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致力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推广和深化，在数个世代均影响重大。^①而猪口孝虽然在学术生涯早期频频发表定量研究成果，包括在国际学界初试啼声的硕士论文、大量介绍性和评论性的论文以及以专著形式日译出版的英文博士学位论文等，但后期却较少涉及。^②鴨武彦（1942—1996年）^③、高木诚一郎（1943年—）^④、猪口邦子（1952年—）^⑤、田中明彦（1954年—）^⑥等学者的情况也与猪口孝相似。从他们的学术经历和成果可以看出，一方面，该时期的定量研究成果与前一时期相近，仍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宣介的特点；另一方面，海归学者的方法论取向需要考虑日本学界的整体容受程度，因此在后续阶段出现了重点偏移。当然，早期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也为上述学者日后的多元选择和动态调适奠定了基础。例如，山影进（1949年—）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颇感兴趣，且多

^① 其早期作品参见：山本吉宣「戦争拡大の確率モデル—国際紛争の数理モデルの一例—」、『国際政治』第55号、1976年、27—43頁；山本吉宣「国際体系の数理モデル—同盟形成の視点から—」、『埼玉大学紀要 教養学部』第15卷、1979年、53—103頁；山本吉宣・葉師寺泰蔵「国際政治における計量的な構造把握」、『行動計量学』第7卷第2号、1980年、33—52頁。

^② 参见：Takashi Inoguchi, "Measuring Friendship and Hostility among Communist Powers: Some Unobtrusive Measures of Esoteric Communic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 Issue 1, 1972, pp. 79—105；猪口孝『国際関係の数量分析—北京・平壤・モスクワ1961年—1966年—』、巖南堂書店、1970年；猪口孝「戦争と平和に対する態度の国際比較—国家間比較調査データの多次元解析—」、『国際政治』第42号、1970年、56—67頁；宮武信春・猪口孝「2国間交渉過程の分析と予測—日ソ漁業交渉、1957年—1977年—」、『計測自動制御学会論文集』第14卷第3号、1978年、236—241頁；猪口孝「政治学における方法論的諸問題」、『行動計量学』第10卷第1号、1982年、29—35頁；猪口孝『外交態様の比較研究—中国・英国・日本—』、巖南堂書店、1978年。

^③ 鴨武彦「国際政治統合の理論的考察—行動主義アプローチの試み—」、『国際政治』第50号、1974年、1—24頁。

^④ 参见：Takagi Seiichiro, "An Analysis of Chinese Behavior toward Japan, 1950—1965: An Examination of Three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Behavior",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7；高木誠一郎「『国民経済発展十か年計画要綱』の後退と因果関係の認識—認知構造図法による接近—」、衛藤瀧吉編『現代中国政治の構造』、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82年、238—275頁。

^⑤ Kuniko Y. Inogushi, "Dynamics of Imperial Decline: A Diagrammatic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1980, pp. 90—106.

^⑥ 参见：Akihiko Tanaka,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ehavior 1949—1978", Ph. D. Dissertation, MIT, 1981；田中明彦「中国の国際紛争行動のマクロ・モデル 1950—1978」、『アジア研究』第29卷第1号、1982年、51—86頁；田中明彦「政策決定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中国—」、『国際政治』第74号、1983年、134—153頁；壇野英次・田中明彦「国際システムの安定」、山本吉宣・田中明彦編『戦争と国際システム』、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有产出。^①他在赴美留学和回国任教后，其研究的主攻方向聚焦于东南亚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但在退休前后，山影进的研究路径又出现了某种“转向”或曰“回归”，他与光过克马、阪本拓人等门下年轻学者一道，关注多主体模拟（multi – agent simulation）等研究方法，再一次引领了“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兴领域的风潮。^②

第二，受国际学界的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主流方法和理论出现了新的阶段性变化。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随着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现实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势头的出现，定量研究的“用武之地”显著拓展，涉及国别外交、南北关系、贸易摩擦、相互依存、区域合作等一系列议题。受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等学者研究的触动，认知结构理论也成为日本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③ 80 年代，源自美国学界的“理性选择革命”开始影响日本，并成为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同时也引起颇多争议。^④ 随着新的理论热点接连涌现，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机制化建设不断取得进展。例如，在关宽治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1989 年 1 月，“日本模拟与博弈学会”（JASAG）成立，并于 1990 年起公开出版会刊《模拟与博弈》。

第三，颇具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加入其中。在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发展的前两个世代，虽然成员人数较少，但在资深学者的引领和带动下，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因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共同兴趣而走到一起。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初创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成果的引注和参考文献几乎全为外文，间或附带极少数日本学者的纯方法论著作，但从发展期开始，日文论文和著作间的彼

① 参见：林雄二郎・山影進・吉井博明「カスケード型国際構造の中の日本—日本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国際環境を構築するための国際交流の進め方ー」、『世界経済評論』第 17 卷第 9 号、1973 年、4—15 頁；山影進・城信雄・吉井博明「相互関係の強さと歪みの計量化的ー方法」、『行動計量学』第 2 卷第 1 号、1974 年、33—40 頁。

② 参见：山影進・服部正太編『コンピュータのなかの人工社会—マルチエージェン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モデルと複雑系ー』、共立出版、2002 年；山影進『人工社会構築指南—artisocによるマルチエージェン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入門ー』、書籍工房早山、2007 年；山影進・阪本拓人・保城広至『ホワイトハウスのキューバ危機—マルチエージェン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探る核戦争回避の分水嶺ー』、書籍工房早山、2012 年。

③ 参见：山本吉宣・谷明良「認知構造図（cognitive map）対外政策決定分析の1つの手法」、『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経営の科学』第 24 卷第 8 号、1979 年、462—470 頁；国際体制研究会編『認知構造図による対外政策決定分析』、世界経済情報サービス、1980 年。

④ 飯田敬輔「序論 国際政治における合理的選択」、『国際政治』第 181 号、2015 年、1—14 頁。

此引证逐渐增多，跨越国境的学术对话也初具雏形。以 1987 年 10 月创刊的《利维坦》为主要平台，猪口孝、大岳秀夫、村松岐夫、蒲岛郁夫等学者在日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大力推动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

可以说，这一时期定量研究已经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扎下根。^① 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不仅将成果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而且在国际顶级刊物上也初露锋芒。^② 同时，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经典作品继续被翻译成日文出版。^③

这一世代的日本学者可谓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柱，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咨政建言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例如，自 1994 年鴨武彦任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长以来，多位理事长均由留美博士担任。不少学者虽已高龄，但至今仍在学界发挥余热，其对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贡献令人感佩。

三、成熟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巩固与普及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淀，日本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步入了成熟期。冷战结束这一历史转折点不仅见证了学界新老代际间的自然更替，更直接塑造了新秩序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进一步强化了研究范式的“美式路径”。具体而言，冷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表现出四方面特点。

第一，从事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中坚力量逐步成型。铃木基史（1959 年—）、饭田敬辅（1960 年—）、河野胜（1962 年—）等是这一世代学

^① 毋庸讳言，定量研究方法仍相对“非主流”。根据 1988 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问卷调查，认为计量方法在日本“不兴盛”的比例高达 66%，认为行为科学研究路径“本身存在问题”或对其持“不关心”态度的分别占 37.4% 和 14%，主张对其“应更积极引入”的仅为 26.1%。参见：石川一雄・大芝亮「一九八〇年代の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国際政治』第 100 号、1992 年、281 頁。

^② 参见：Takashi Inoguchi and Nobuharu Miyatake, “Negotiation as Quasi – Budgeting: The Salmon Catch Negotiations between Two World Fishery Pow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3, No. 2, 1979, pp. 229 – 256; Takashi Inoguchi and Nobuharu Miyatake, “The Politics of Decrementalism: The Case of Soviet – Japanese Salmon Catch Negotiations, 1957 – 1977”,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3, No. 6, 1978, pp. 457 – 469。

^③ 参见：ケネス・J. アロー『社会的選択と個人的評価』、長名寛明訳、日本経済新聞社、1977 年；グレアム・T. アリソン『決定の本質—キューバ・ミサイル危機の分析—』、宮里政玄訳、中央公論社、1977 年；チャールズ・A. マクレランド『国際体系と諸理論』、高柳先男訳、福村出版、1979 年；ケネス・E. ボールディング『紛争と平和の諸段階』、武者小路公秀訳、ダイヤモンド社、1980 年；A. ラバポート、A. M. チャマー『囚人のジレンマ—紛争と協力に関する心理学的研究—』、廣松毅・平山朝治・田中辰雄訳、啓明社、1983 年；マンサー・オルソン『集合行為論—公共財と集團理論—』、依田博・森脇俊雅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83 年；ブルース・M. ラセット『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核抑止・軍拡競争・軍備管理をめぐって—』、鴨武彦訳、有斐閣、1984 年；R. アクセルロッド『つきあい方の科学—バクテリアから国際関係まで—』、松田裕之訳、CBS 出版、1987 年。

者的代表。受日本社会国际化加速和“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急剧升值等因素的影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学生赴美留学人数激增。到 90 年代，铃木基史（南卡罗来纳大学，1990 年）、饭田敬辅（哈佛大学，1990 年）、河野胜（斯坦福大学，1994 年）、石田淳（芝加哥大学，1995 年）等第三世代学者陆续从海外学成归国，并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从这一世代开始，日本学者的学习经历更加多样化，既有像前两个世代一样在日本国内完成高等教育初级阶段的学者，也不乏从本科阶段起便在欧美顶尖大学学习的案例。相较于前辈，他们接受了更为长期和系统的定量研究方法训练，一些学者在博士毕业伊始甚至博士就读期间就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定量研究论文，其英文博士学位论文经修订后也纷纷作为专著出版。^① 当下，这一批学者已经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不少已成为名誉教授或转而就职于私立大学，但过去 30 年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他们的不懈努力。

第二，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的定量研究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成果形式兼具著作和论文，以后者为主，其中著作主要分为教科书和方法论概论、专题研究两大类。1989 年山本吉宣曾指出，与欧美学界不同，彼时在日本尚未出现国际关系定量模型的概论式著作。^② 这一遗憾在该时期得到有效弥补。

这一世代的日本国际关系学者，除了个人研究之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编撰了大量优秀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教科书，这对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的普及功莫大焉。^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松原望和饭田敬辅主编的《国际政治的数理计量分析入门》，该书侧重数理分析（博弈论）和计量分析（统计学），

① 例如：Keisuke Iida, “When and How Do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 Two – 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7, No. 3, 1993, pp. 403 – 426; Motoshi Suzuk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Relative Gain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3, 1994, pp. 475 – 498; Keisuke Iid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② 山本吉宣「国際政治学における数理的なモデル」、有賀貞・宇野重昭・木戸義・山本吉宣・渡辺昭夫編『講座国際政治（1）国際政治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年、363—364 頁。

③ 在此之前的代表性教科书，参见：佐藤英夫『对外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年；永久寿夫『ゲーム理論の政治経済学—選挙制度と防衛政策—』、PHP 研究所、1995 年。这一世代学者编写的大量涉及国际关系的方法论教科书参见：松原望『ゲームとしての社会戦略—計量社会科学で何がわかるか—』、丸善出版、2001 年；松原望『社会を読みとく数理トレーニング—計量社会科学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年；久米郁男『原因を推論する—政治分析方法論のすゝめ—』、有斐閣、2013 年；加藤淳子・境家史郎・山本健太郎編『政治学の方法』、有斐閣、2014 年；広瀬佳一・小笠原高雪・小尾美千代編著『よくわかる国際政治』、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 年；加藤淳子『政治学原論—方法・理論・実証—』、東京大学出版会、2025 年。

结合数十个国际关系案例作了深入讲解。^①此外，部分学者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在各自编撰的教科书中强调定量方法，其中尤以铃木基史所著《国际关系》及其与饭田敬辅主编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解说与实践》为代表。^②前者被编入东京大学出版会编撰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模型”系列丛书，后者则涉及博弈论、计量分析、文本分析、调查实验等多种方法。更有大量教科书偏重方法论和相关工具的介绍，以国内政治为重点，同时在案例讲解部分，结合防卫政策选择、武装冲突的第三方干涉、核不扩散、日美贸易摩擦等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案例，对国际关系议题也有所涉及。一些著作还被英译后在国际学界再版。^③同时，对内引介国际学界的前沿成果继续得到重视。例如，作为一位侧重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国际关系学者，泉州泰博翻译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方法论名著。^④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例如，大芝亮（1954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定量研究剖析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吉田和男、石黑馨、冈田章等经济学家亦积极参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从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视角，充分发挥其方法论优势，对霸权稳定论、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外援助与合作、经贸协定谈判以及区域一体化等议题作了定量阐述。^⑤此外，外交谈判和国际政治经

① 松原望・飯田敬輔編『国際政治の数理・計量分析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

② 参见：铃木基史『国际関係』、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铃木基史・饭田敬輔編『国际関係研究の方法—解説と実践—』、东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

③ 参见：Motoshi Suzuki and Akira Okada eds., *Game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New York: Springer, 2017; Shingo Hamanaka, Hiroyuki Aoyama and Yutaka Takaoka eds., *World Order from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in the Middle Eas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ception and Cross-Border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Awareness Based o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New York: Springer, 2024.

④ 参见：アレキサンダー・ジョージ、アンドリュー・ベネット『社会科学のケース・スタディー理論形成のための定性的手法—』、泉州泰博訳、勁草書房、2013年；ロバート・ジャービス『複雑性と国際政治—相互連関と意図されざる結果—』、荒木義修・泉州泰博ほか訳、ブレン出版、2008年；ヘンリー・ブレイディ、デヴィッド・コリアー『社会科学の方法論争—多様な分析道具と共通の基準—』、泉州泰博・宮下明聰訳、勁草書房、2008年。

⑤ 参见：吉田和男『安全保障の経済分析—経済力と軍事力の国際均衡—』、日本経済新聞社、1996年；石黒馨『国際政治経済の理論—覇権協調論の構想—』、勁草書房、1998年；吉田和男・井堀利宏・瀬島誠編『地球秩序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分析』、日本評論社、2009年；石黒馨『インセンティブな国際政治学—戦争は合理的に選択される—』、日本評論社、2010年；岡田章『ゲーム理論・入門—人間社会の理解のために—』、有斐閣、2014年；石黒馨『国際貿易交渉と政府内対立—2レベルゲーム分析—』、勁草書房、2017年；石黒馨『グローバル政治経済のパズル—ゲーム理論で読み解く—』、勁草書房、2019年；岡田章『国際関係から学ぶゲーム理論—国際協力を実現するために—』、有斐閣、2020年；岡田章『ゲーム理論』（第3版）、有斐閣、2021年。

济学领域的教科书也多有定量研究方法介绍。^①

四、深化期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分化与创新

进入 21 世纪，随着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②，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进入深化发展期，表现出三方面特点。

第一，日本中青年学者的国际存在感日益增强。栗崎周平（1973 年—）、阪本拓人（1975 年—）、多湖淳（1976 年—）、窟田悠一（1977 年—）、东岛雅昌（1982 年—）等第四世代学者的代表便是典型。其背景之一在于，这一时期，更多的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从欧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③

其中，多湖淳是过去 20 余年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成果最多的日本学者之一。其日文著作《武力行使的政治学：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国际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创建了 1948—2004 年美国对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自主数据库（USMPAD1.2），通过多项逻辑模型与赫克曼概率模型的回归分析，考察美国单边或多边的政策选择及其国内外互动诱因，并借助第一次海湾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第二次海湾战争等案例研究加以验证。^④ 该书出版十年之后，他又推出了《何为战争》一书，对于战争的本质这一抽象主题开展了基于数据的实证主义研究。^⑤ 此外，栗崎周平主持的“关于构建冲突研究‘东京学派’的构想”（2015—2019 年），“通过大数据开拓国际关系学”（2018—2023 年），“数据科学揭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23—2028 年）等多个课题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其成果也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⑥ 阪本拓人则长于跨学科

^① 参见：石黒馨『入門・国際政治経済の分析—ゲーム理論で解くグローバル世界—』、勁草書房、2007 年；竹内俊隆『政策研究のためのゲームの理論』、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 年。

^② 贺平：《何谓“日本”，何以“国际”——“国际日本学”的机制建设及反思》，《日本学研究》2023 年第 34 辑，第 5—28 页。

^③ 例如：阿久津博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6 年）、栗崎周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7 年）、笼谷公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0 年）、岩波由香里（罗切斯特大学，2012 年）、原田胜孝（芝加哥大学，2012 年）、大槻一统（纽约大学，2014 年）、小浜祥子（弗吉尼亚大学，2014 年）、片桐梓（斯坦福大学，2016 年）、菊田恭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2019 年）等。

^④ 多湖淳『武力行使の政治学—単独と多角をめぐる国際政治とアメリカ国内政治—』、千倉書房、2010 年。

^⑤ 多湖淳『戦争とは何か—国際政治学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20 年。

^⑥ Shuhei Kurizaki, “Efficient Secrecy: Public versus Private Threats in Crisis Diplo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3, 2007, pp. 543–558.

研究，包括：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观念和规范的大规模文本分析，对西非和撒哈拉地区的实地调查、卫星图像分析和模拟研究，将网络科学应用于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学理论重构，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深化定量冲突研究等。东岛雅昌于201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其博士学位论文在较短时间内相继以英文和日文出版，并屡获嘉奖。^①此外，葛岛早纪、高桥知子等更为年轻的学者也开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露才华。

第二，随着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队伍的壮大，学者的职业背景和发展路径也日益多元。部分日本学者受聘于海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例如直井惠（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千叶大奈（埃塞克斯大学等）、白糸裕辉（密歇根大学）等，而且往往与日本学界保持紧密的良性互动。^②田中世纪等学者甚至在日本国内获得学位后至境外大学长期任教。坂本正树等学者则供职于丸红经济研究所等智库，还有不少研究者在政府机构、媒体和企业任职。

得益于定量方法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深耕，西川贤、林光、山尾大、富永靖敬、日高薰、伊藤岳、土井翔平等崭露头角的日本学者，虽有短期海外访学经历，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归学者”。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等培养了诸多人才。而且，越来越多毕业于日本本土高校的年轻学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大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性别战”博弈模型、议程设置模型、分层博弈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③其中不少优秀论文还以专著的形式出版。^④

第三，如果聚焦21世纪以来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那么

^① 参见：Masaaki Higashijima, *The Dictator's Dilemma at the Ballot Box: Electoral Manipulation, Economic Maneuvering, and Political Order in Aut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東島雅昌『民主主義を装う権威主義—世界化する選挙独裁とその論理—』、千倉書房、2023年。

^② Megumi Naoi, *Building Legislative Coalitions for Free Trade in Asia: Globalization as Legis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参见：川島康子「気候変動問題の解決に向けた国際協調の可能性に関する研究」、東京工業大学、1997年；山本元「冷戦終結後の軍拡1992—1995」、東京工業大学、2001年；藤田泰昌「GATT/WTO紛争処理をめぐる先進民主主義諸国の政策選択—質的比較分析（QCA）によるアプローチー」、上智大学、2008年；西館崇「1990年代の朝鮮半島における日米韓の安全保障協力の条件—両性の闇いからの分析—」、東京大学、2010年；林光「新しい外交による国際制度形成の理論と実証」、東京大学、2016年。

^④ 参见：森川裕二『東アジア地域形成の新たな政治力学—リージョナリズムの空間論的分析—』、国際書院、2012年；中井遼『デモクラシーと民族問題—中東欧・バルト諸国の比較政治分析—』、勁草書房、2015年；芝井清久『東アジアの核拡散と欧州の核不拡散のトレード・オフ—東アジア非核化に向けた歴史的考察—』、大学教育出版、2019年。

从学科领域而言，尤以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学以及外交专题研究为重点。尽管这些领域彼此间存在交叉，但其定量研究路径各具特点。其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结合民调等多重数据来源，一些学者对中东、北非、拉美、前南地区甚至欧美和日本本土做了深入的研究，^① 其中不乏在国际学界出版的外文专著^②。这类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学色彩，关注特定国家内部的政治动态，如民主化进程、政治转型、政治极化、排外主义等。但如果把外交视为内政的延伸和反映，注重国际、国内两个意象的双向作用，那么此类研究也兼具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纵览国际知名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专著可以发现，跨国数据分析与一国国内案例研究并用的混合方法日益普遍。^③ 在这一背景下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一部分学者将日本区域研究的传统优势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在对象国和地区开展问卷调查，运用“潜在语义分析”（LSA）等方法，为扎实的定量研究奠定了独有的数据基础。^④ 猪口孝曾指出，

① 参见：增田正『現代フランスの政治と選挙』、蘆書房、2001年；山本純一『インターネットを武器にした「ゲリラ」—反グローバリズムとしてのサバティスタ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待鳥聰史『財政再建と民主主義—アメリカ連邦議会の予算編成改革分析—』、有斐閣、2003年；浜中新吾『パレスチナの政治文化—民主化途上地域への計量的アプローチ—』、大学教育出版、2002年；阪本拓人『領域統治の統合と分裂—北東アフリカ諸国を事例とするマルチエージェン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分析—』、書籍工房早山、2011年；久保慶一・河野勝編『民主化と選挙の比較政治学—変革期の制度形成とその帰結—』、勁草書房、2013年；岡田勇『資源国家と民主主義—ラテンアメリカの挑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6年；松本俊太『アメリカ大統領は分極化した議会で何ができる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川中豪編著『後退する民主主義、強化される権威主義—最良の政治制度とは何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年；久保慶一『争われる正義—旧ユーゴ地域の政党政治と移行期正義—』、有斐閣、2019年；田中（坂部）有佳子『なぜ民主化が暴力を生むのか—紛争後の平和の条件—』、勁草書房、2019年；浜中新吾・青山弘之・高岡豊編著『中東諸国民の国際秩序観—世論調査による国際関係認識と越境移動経験・意識の計量分析—』、晃洋書房、2020年；中井遼『欧州の排外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調査からみる世論の本質—』、新泉社、2021年；北村周平『民主主義の経済学—社会変革のための思考法—』、日経BP、2022年；ケネス・盛・マッケルウェイン『日本国憲法の普遍と特異—その軌跡と定量的考察—』、千倉書房、2022年。更早的研究参见：栗田宣義『社会運動の計量社会学的分析—なぜ抗議するのか—』、日本評論社、1993年。

② Yuichi Kubota, *Armed Groups in Cambodian Civil War: Territorial Control, Rivalry, and Recruit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③ 東島雅昌「多国間統計分析と国内事例研究による混合手法—分析アプローチとしての発展と方法論的限界への処方箋—」、『アジア経済』第62巻第4号、2021年、49—78頁。

④ 参见：永井史男・岡本正明・小林盾編著『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地方ガバナンスの計量分析—タイ、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の地方エリートサーベイから—』、晃洋書房、2019年；山尾大『紛争のインパクトをはかる—世論調査と計量テキスト分析からみるイラクの国家と国民の再編—』、晃洋書房、2021年；山尾大・久保慶一「計量テキスト分析による関係性分析」、酒井啓子編集『グローバル関係学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20年、168—190頁。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政治学研究的三大趋势之一在于，日本学者越来越多地注重从新的自我意识出发，开展数据收集和理论建构。^①显然，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发展也是这一判断的生动注脚。

其二，在专题研究中，主要涉及外交决策与国内政治的互动、战争与武装冲突等议题。多湖淳的《武力行使的政治学》《何为战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如果说初创期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如何避免战争、营造和平等宏观主题，那么这一时期对战争和冲突的定量研究则更聚焦中观和微观层次，试图探究其作用机理。此外，安全保障始终是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重点领域，并进一步延伸至冲突、纷争、发展援助等细分议题。这充分体现在汇集了众多日本知名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纷争与协调的博弈论》一书中。^②

除了上述两类具体议题的研究之外，也有日本学者借用定量方法对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探讨。^③接续前述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同样出现了诸多方法论的教科书。^④在“因果推论革命”下，行为科学主义出现一定的复兴。^⑤一方面，文本分析等传统方法在改进和升级之后，展示出新的应用场景和价值。^⑥另一方面，新一代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涌现。以伊藤隆太、森川友义、井手弘子、加藤淳子、境家史郎等学者为代表，近年来从演化政治学、神经科学等学科视角开展的国际政治研究方兴未艾。^⑦关注和利用人工智能、

① 猪口孝『政治理論』、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年、152—157頁。

② 该书涉及四大主题：国际公共产品与集体行为、法治与政治、民主主义与协议达成、外交与信息。参见：鈴木基史・岡田章編『国際紛争と協調のゲーム』、有斐閣、2013年。

③ 山本和也『ネイションの複雑性—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の新地平—』、書籍工房早山、2008年。

④ 参见：松田憲忠・竹田憲史編著『社会科学のための計量分析入門—データから政策を考え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飯田健『計量政治分析』、共立出版、2013年；保城広至『歴史から理論を創造する方法—社会科学と歴史学を統合する—』、勁草書房、2015年；浅古泰史『政治の数理分析入門』、木鐸社、2016年；浅古泰史『ゲーム理論で考える政治学—フォーマルモデル入門—』、有斐閣、2018年；浅古泰史・岡斎大・森谷文利『活かすゲーム理論』、有斐閣、2023年；鳥海不二夫編著『計算社会科学入門』、丸善出版、2021年。

⑤ 稲谷祐子「政治学における『因果推論革命』の進行」、『アジ研ワールド・トレンド』第269号、2018年、70—71頁。

⑥ 伊藤亜聖・于海春・御器谷裕樹・林載桓「量的テキスト分析による現代中国研究—『古くて新しい方法』の展開と課題—」、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シリーズJ-253、2024年。

⑦ 参见：井手弘子『ニューロポリティクス—脳神経科学の方法を用いた政治行動研究—』、木鐸社、2012年；伊藤隆太『進化政治学と国際政治理論—人間の心と戦争をめぐる新たな分析アプローチ—』、芙蓉書房出版、2020年；伊藤隆太『進化政治学と戦争—自然科学と社会科学の統合に向けて—』、芙蓉書房出版、2021年；伊藤隆太『進化政治学と平和—科学と理性に基づいた繁荣—』、芙蓉書房出版、2022年；伊藤隆太編著『国際政治と進化政治学』、芙蓉書房出版、2023年。

深度学习、大数据、大模型应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也渐次出现。

五、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演进的影响要素

前述四个时期的划分，从历时的角度对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演进的脉络作了梳理：将战前出生、在战后初期高度活跃的学者归为第一世代，之后大致按照每 20 年的年龄差划为一个世代。^① 这与田口富久治对日本政治学者的世代划分相近。由此可以认为，迄今为止日本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经历了初创、发展、成熟、深化等四个时期。受时代变迁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各世代学者及其研究各具特征，学者之间虽有师承关系，但其教育背景、职业历程不尽相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与运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有所区别（参见表 1）。

表 1 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分期与表现

分期	时间段	世代分布与代表性学者	核心议题	主要方法和理论	主导性影响因素
初创期	20 世纪 50 年代末—70 年代中期	第一世代：关宽治、武者小路公秀	战争与和平	博弈论、文本分析等	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
发展期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90 年代初期	第二世代：猪口孝、山本吉宣、药师寺泰藏等	体系、结构及冲突	计算机模拟、理性选择等	内部学术生态的催化
成熟期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21 世纪初	第三世代：铃木基史、饭田敬辅、河野胜等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主题	调查实验等	国际化背景下的内外合力
深化期	21 世纪初以来	第四世代：多湖淳、栗崎周平、阪本拓人、东岛雅昌等	更为多元，强调国际国内互动	社会网络分析、演化政治学、神经科学等	上述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学术史视角下的影响要素

对于大部分国家和研究领域而言，其学术发展主要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国内学术生态，无论议题、理论还是方法、路径，都必须适应内部学术发展的环境和需求。这一因素相对稳定，学术传承的路径依赖效应较为明显。其次是该领域学术发展的国际态势和外部牵引，特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① 不同的世代之间或有交叉。例如，从年龄而言，猪口孝属于第二世代，但事实上在其获得博士学位和学成归国之前（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已经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变迁。相比前者，这一因素的变化更为频繁，受制于时代背景、价值判断、技术递进等。上述两个因素不可偏废，且都必须通过第三个更微观的因素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即学者个人的偏好及其造成的群体和世代特征，人际网络、学术经历、绩效评价是其重要中介变量。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发展无疑是上述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重。在初创期，主要是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使然，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学界的风起云涌及其引起的巨大争论只是间接且零星地反映在个别学者身上，并未在日本同样生成一个“时代话题”。相反，这一时期的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有着自身鲜明的议题关切和分析路径，其标志性事件是高坂正尧、坂本义和、永井阳之助等学者之间展开的现实主义争论，但这场争论主要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发展期，由于“利维坦世代”学者的积极推动，日本国内对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价值评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其影响延续至今。到了成熟期，随着日本学术界国际化进程的加深，国内意义上的“传承”与国际意义上的“接轨”日益交织，进而转化成日本学界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发展轨迹。当下正处于深化期，随着第二乃至第三世代的学者渐渐退出学术舞台的中心，新一代的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者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传统”与“主流”。

值得强调的是，日本自身的国别特征（相对性）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普遍性）这两个因素尽管存在差异乃至错位，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零和关系。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区域研究就是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两者均为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和优势领域，但受到内外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史领域，1956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创立之初，大部分会员均从事历史研究，尤以日本外交史研究为重点。^①之后，受兰克史学理念的影响，该领域的学者始终注重档案挖掘和史实梳理等方法，因此，尽管确实存在初创期的定量研究尝试以及后期多湖淳等学者的精品力作，但相较于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计量史学在日本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存在感仍难言彰显。在区域研究中，新一代学者同样深受田野调查和“深描”等定性方法的影响。尽管如此，受比较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熏陶，且得益于跨国问卷调查等

^① Takashi Inoguchi, “Are There An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369–390.

技术条件的成熟，他们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产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

（二）学科史视角下的实践支撑

在上述学术史演进的背后，离不开学科发展在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支撑。作为一种相对宽泛的方法，定量研究本身并不是与学位相对应的“专业”，但需要系统的学术训练和配套机制，包括“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支点机构和团队的示范作用、国际化的双向交流、学会和刊物等制度载体的支持。

第一，在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上，定量研究方法的教学和训练加速普及。如今绝大部分日本知名大学均开设了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课程，以基础统计学或数据分析为主，一些大学还进一步设置了更为细分和高阶的课程。例如，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拥有极为全面和系统的定量研究方法课程体系。2003 年，早稻田大学获得 21 世纪 COE 项目^①——“构筑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GLOPE），从 2004 年度起在政治经济学部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统计分析、博弈论、数理经济等方法论课程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从 2008 年度开始，早稻田大学又在研究生层面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全球 COE 项目“制度建构的政治经济学”（GLOPE II）也于同年启动。^② 以 2024 学年为例，其本科生课程方案中专设“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大类，由数学、实证分析和博弈论三个板块组成，包含近 30 门定量研究方法课程。^③

前已述及，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呈现较为明显的梯度增长特征，这正是教学相长的直接体现。首先，定量研究的起步需要“先驱”学者的引介和推广，而其持续发展更有赖于代际传承。例如，山本吉宣曾接受卫藤沈吉的指导，而作为第四世代学者代表的多湖淳先后受教于山本吉宣、古城佳子、石田淳等第二世代和第三世代学者。栗崎周平在上智大学法学部求学期间与猪口邦子有师生之谊，而后者又曾经是武者小路公秀的学生。其次，教学体系的完善使新一代的日本学者自本科阶段就接受了不断强化的方法论训练，也塑造了将定量研究视为常态的学术氛围。因此，乐于和善于从事定量研究的日本学者的数量呈上升之势，成果的质量亦水涨船高。

第二，学术风格的世代传递和精英学者的集聚往往促使其团队形成一定

① COE（Center of Excellence）意为“卓越研究基地”。

② 田中愛治「序文 新たな政治経済学へ向けて」、河野勝編『新しい政治経済学の胎動—社会科学の知の再編へ—』、勁草書房、2013 年、5 頁。

③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024 年度版学部要項」、2024 年、https://www.waseda.jp/fpse/pse/assets/uploads/2024/03/2024_SPSE_School_Study_Guide_JDP.pdf [2025-06-15]。

的“机构特质”，而特定机构的规模效应和路径依赖又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例如，得益于山本吉宣、药师寺泰藏、吉村融等学者的功劳，埼玉大学大学院政策科学研究所（GSPS）特别是其“行为科学信息解析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前期一度成为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支点机构。进入21世纪，随着定量研究学者的增多，部分大学也形成了显著的团队效应，塑造了鲜明的学术品牌。早稻田大学最为突出，其影响力甚至溢出学术界，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①该校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政治经济学部、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以及政治经济学院可谓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一方重镇。基于定量方法，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学者切磋琢磨，在其出版的系列丛书等作品中，传统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其中，多湖淳、栗崎周平、渡边耕平等学者还持续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成果，学术声量日隆。2024年6月，山本铁平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加盟早稻田大学，使得该校研究实力进一步提升。因此，若以顶尖期刊上的成果发表作为衡量院系学术产出的核心指标，早稻田大学已成为亚洲范围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最突出的大学之一。^②此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大学等的定量研究学者也各具规模。

第三，日本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起步、壮大和成熟的。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政治学研究经过三次革命：从历史学分离、行为主义革命、对实证主义的重视。^③日本都参与其中，特别是后两次革命，恰与前文提到的初创期、成熟期和深化期重叠。在初创期，武者小路公秀等学者的早期研究成果脱胎于国际交往，其中一些论文是作者赴欧美参加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等境外学术活动的成果原稿与译稿。^④在此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学成归国，定量研究队伍的规模日渐扩大。部分学者虽无海外学位，但深度的国际交流是其研究精进的有益助力。例如，多湖淳尽管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均就读于东京大学，但攻读博士期间在密歇根大学长达两年半的访问研究对其日后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这种“国

① 「看板教授の早慶戦」、『文藝春秋』2024年10月号、198—201頁。

② Joan Barceló, Christopher Paik, Peter van der Windt and Haoyu Zhai, “A Global Ranking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25.

③ Matthew Charles Wilson, “Trends i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Progres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0, Issue 4, 2017, pp. 979—984.

④ 武者小路公秀「日米交渉行動の比較研究—ケーミングによる接近—」、『国際政治』第42号、1970年、82—105頁。

际化”是双向的。除了发表学术成果之外，近年来，日本学者在全球国际关系学术机构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例如，在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中，已有武者小路公秀、田中爱治两位日本学者担任过主席，而柏谷祐子则从 2025 年 7 月起成为现任主席。

第四，日式学会体制和诸多学术刊物也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聚集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助力。在学会方面，日本政治学会和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作用尤为突出。以日本政治学会为例，根据其 2019 年的最新组织修订，目前一共有 18 个“分领域研究会”，其中的“地区一体化研究会”“冷战史研究会”“欧美政治研究会”等明显带有“国际关系”研究色彩。^①而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研究分科会”分为“历史”“地域”“理论”“非国家主体”等四个群组，大量细分领域和主题又与国别和国内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存在交叉。^②因此，在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吸收和运用方面，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界与政治学界既各具特点，又多有重叠和互动。

作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会刊，1957 年创刊的《国际政治》每一期均设特定主题，在政治外交史、双边关系史、国别和地区研究的基础上，较早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例如，在 1959 年第 9 期“国际政治学的体系”专辑中，关宽治发表了长文《国际政治学的数学方法：以博弈论为中心》；1972 年第 42 期推出了“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方法”专辑，除收录六篇相关研究论文之外，刊末还附有长达 15 页的《国际关系数据检索目录》。之后，《国际政治》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作集中探讨，例如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后，陆续编撰了以“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证”（1983 年第 74 期），“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相克与对话”（2009 年第 155 期），“国际政治的理性选择”（2015 年第 181 期），“寻找替代方案：重新审视国际政治学”（2020 年第 200 期）为主题的专辑。此外，在作为单篇论文汇总的各期“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沿”特辑中，也经常出现定量研究成果。近年来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年度研究大会的分科会发言中，几乎每年都有定量研究的身影，其中的不少作品日后发表于《国际政治》等刊物。

在国际关系类的其他学术期刊中，表面上看，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

^① 日本政治学会「分野別研究会一覧表」、<https://www.jpsa-web.org/society/information/bunyabetsu/research-list/> [2025-06-15]。

^②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組織構成」、<https://jair.or.jp/about/organization.html> [2025-06-15]。

的《国际问题》(1960年4月创刊)、外务省主编的《外交》(2010年9月创刊)等相对偏向政策分析,但事实上,《国际问题》早在1970年就推出了多篇涉及国家认知、国力测量、国际体系、同盟内部稳定性等议题的定量研究成果。此外,日本政治学会主办的《年报政治学》(1950年创刊)、日本比较政治学会主办的《比较政治学会年报》(1999年创刊)、国际法学会主办的《国际法外交杂志》(1902年创刊)等刊物也不排斥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政治理学期刊《利维坦》(1987年10月创刊)刊载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更为可观。

不少其他学会及其成员也以不同方式深度参与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例如,1973年成立的日本行为计量学会在1974年创办刊物《行为计量学》,从第一期起就将国际关系研究纳入视野。^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还积极鼓励会员参加日本行为计量学会主办的计量研究方法研习班。在日本运筹学会(1957年成立)主办的《运筹学》、日本数理社会学会发行的《理论与方法》、日本公共选择学会主编的《公共选择》等刊物上,也多见国际关系定量研究。^②此外,不少新兴的学会都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志趣相投。日本应用数理学会设有“数理政治学研究部会”,自2005年起学术活动和出版频繁。^③日本计量数理政治学会(JSQPS)则由2009年召开的学术会议“计量数理政治学的前沿”发展而来。在其前身“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基础上,计算社会科学院(SCSSJ)也于2022年2月正式成立并推出学会会刊。

六、对于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反思

自定量研究方法兴起以来,围绕这一方法论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主要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层面展开,前者探究其方法和手段的效用,后者则追问其终极目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战后日本学界在这方面的思辨具有四个特点。

^① 参见: 関寛治「国際システム論における行動計量学の課題」、『行動計量学』第1巻第1号、1974年、4—14頁; 池田央「行動・社会科学としての行動計量学」、『行動計量学』第1巻第1号、1974年、20—25頁。

^② 参见: 飯田敬輔「交渉者はタカ派か中道か—『二層ゲーム』における交渉者選択過程ー」、『理論と方法』第9巻第1号、1994年、3—20頁; 石田淳「国内所得配分の对外政策効果」、『理論と方法』第10巻第2号、1995年、133—146頁; 清水寛文「同盟の経済学」、『公共選択』第64号、2015年、82—100頁。

^③ 大山達雄編『選挙・投票・公共選択の数理』、共立出版、2022年。

第一，对定量研究并不是拿来主义式的全盘接受。源自欧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被引入日本的过程中，往往经历了消化吸收和选择性接纳的过程，在定量研究等方法论层面也不例外。其中一个特殊背景在于，早在二战之前，受到更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影响，日本的国际关系学就被认为存在“方法论过剩”的缺陷，过于强调抽象的定义和概念框架，本质上缺乏实证性和哲学基础。^① 有鉴于此，战后日本学界对于定量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始终不乏思考，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盲从则被批判为“经验的保守主义”。

具体而言，围绕“传统方法”与“科学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行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定位、定量方法在应用实践中的长短优劣、政策分析模型等工具的内生问题，日本学者多有省思。^② 针对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分支以及计算机模拟等具体方法，也不乏带有批判意义的综述性回顾。^③ 例如，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猪口孝就提出了对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计量政治学方法的三点主张：反对“方法主义”，倡导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其在现象说明时过度追求变量间的强因果关系，不如重视对现象本身的准确描述和再现；与其仓促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不如重视试验模型的阶段性创建及其改进。^④

① 二宮三郎「日本の国際政治学の開拓者たち」、『流通經濟大學論集』第 27 卷第 1 号、1992 年、52—53 頁。

② 参见：山本吉宣「行動論以後の計量政治学」、『年報政治学』第 27 卷、1976 年、203—226 頁；山本吉宣「序説・国際政治の理論と実証」、『国際政治』第 74 号、1983 年、1—14 頁；薬師寺泰蔵「政策分析におけるモデリングの諸問題」、『年報政治学』第 34 卷、1983 年、33—50 頁。

③ 参见：猪口孝「計量政治学の展望」、関寛治編『国際政治学を学ぶ—危機状況打開のための現代国政理論のシナリオー』、有斐閣、1981 年、201—224 頁；猪口孝「計量政治学」、内山秀夫編『講座政治学 I 政治理論』、三嶺書房、1999 年、257—276 頁；山本和也「国際政治学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歴史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44 冊、2003 年、391—432 頁；光辻克馬・山影進「国際政治学における実証分析とマルチエージェン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架橋—国際社会の基本的規範の交代をめぐって—」、『国際政治』第 155 号、2009 年、18—40 頁；宮崎麻美「渡期のネットワーク分析—国際関係理論（IR）への適用の評価—」、『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第 14 卷第 1 号、2009 年、139—156 頁；猪口孝「国際比較政治研究と計量政治学」、柳井晴夫編『行動計量学への招待』、朝倉書店、2011 年、134—144 頁；多湖淳「国際政治学における計量分析」、『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経営の科学』第 56 卷第 4 号、2011 年、215—220 頁；山本和也「理論の変容—1990 年代以降の国際関係論と公共選択論—」、『公共選択』第 64 号、2015 年、63—81 頁；飯田敬輔「序論 国際政治における合理的選択」、『国際政治』第 181 号、2015 年、1—14 頁；泉川泰博「エージェント構造問題に関する理論研究の新潮流—」、『国際安全保障』第 44 卷第 4 号、2017 年、8—23 頁。

④ 猪口孝「計量政治学の問題と展望」、『日本統計学会誌』第 6 卷第 1 号、1976 年、39—60 頁。

第二，“大辩论”的缺位与渐进式的调适。与政治学领域“战后政治学”^①与“实证主义派”之间的大规模争论不同，国际关系领域围绕定量研究的争鸣似乎并未形成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格局。同样，与政治学相比，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特定定量研究方法合理与否的探讨也较为平和，鲜有对前辈学者“弑亲”式的批评质疑。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倡导的“方法论革命”在日本更多地是以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展开的。

整体而言，日本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着力在“本土特色”与“国际主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对于“美式”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的吸收固然提高了日本学界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但并未冲淡自身特质及其对该知识领域的民族性贡献。日本学界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上呈现出历史分析、定性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等多种路径并存的特征，定量研究并不追求方法论上的一统天下，无意也无力取代其他方法。这种兼顾不同范式优势、鼓励多元探索的特征，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第三，借助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吐故纳新。定量研究显然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独有现象，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皆有发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日本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述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必须承认，在学科归属和身份认同上，除了猪口孝、河野胜等少数“两栖学者”之外，涉足定量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学科分野仍是相对清晰的。另一方面，由于方法论上的“通约性”，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吸收了大量相关学科的学术养分，也容纳了诸多关联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例如近年来，石黑馨（经济学）、内田忠夫（经济学）、冈田章（数学与系统科学）、清水宽文（经济学）等学者，都被视为广义上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一分子。因此，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定量方法的合理使用也是其打破隔阂、加深对话、实现“共创”的手段和路径之一。^② 不拘泥于单一学科的方法和工具，有益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新陈代谢。例如，

① 参见：小林正弥『政治の恩顧主義論—日本政治研究序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田口富久治『戦後日本政治学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② 大矢根聰「序章 日本の国際政治学：仕切られた対話からの共創？」、『国際政治』第199号、2020年、81—96頁。

相比传统的数理模型，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凸显。^① 国际关系研究也正在开始关注和尝试这一方法。

第四，内部交流与内外对话尚有畸轻畸重之感。对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评判兼具“圈外”和“圈内”两种意涵。在学术兴趣与研究取径上，专注于定量实证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者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区隔。在国际关系学界内部，即便在一般被认为定量方法最为盛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这一状况亦难以否认。^② 其他子领域更是如此。问题是，站在外部视角对其审视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掌握技术细节的“知情圈外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参与讨论，方能推进学术争论的深入。

相比上述理想状态，当前日本学界置身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意气相投”之士仍多为节点分布，与欧美学界的线状或面状格局有所差异。在1998年12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所做的会员调查中，针对可多选的专业方向，1172位做出回答的个人会员中仅有10人选择了“数量分析”，占总数的0.9%。^③ 近20年之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在成立60周年之际所做的又一次学会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兴趣为定量研究的会员只有5位，仅占总数的1.12%；在同时关注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的211位会员中，以定量研究为研究兴趣的会员更是只有1位。^④ 与之相对，外交史研究和区域研究等传统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⑤ 概言之，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者的绝对人数虽有增加，但其比例尚在低位徘徊，与国际同行相比仍大有提升空间。

与定量研究者的基础规模相比，其治学方式同样重要。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合著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方法。由于数据处理的庞大工作量等特性，定量研究更需要也更易促进团队合作而非

① 飯田健「アメリカ政治学における数理モデルの衰退と実験の隆盛—因果効果の概念に着目して—」、『公共選択』第67号、2017年、46—65頁。

② 和田洋典「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経済研究の特徴と課題」、『国際政治』第199号、2020年、116頁。

③ 猪口孝・原田至郎「国際政治研究者の専攻戦略—ロジスティック回帰分析と数量化理論による日本国際政治学会会員の属性分析—」、柳井晴夫・岡太彬訓・繁耕算男・高木廣文・岩崎学編『多変量解析実例ハンドブック（新装版）』、朝倉書店、2013年、494—509頁。

④ 大矢根聰「序章 日本の国際政治学：仕切られた対話からの共創？」、81—96頁。当然，上述数字并非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者的全貌。

⑤ 泉川泰博「日本国際政治学会の安全保障研究」、『国際政治』第199号、2020年、102—103頁。

“单枪匹马”。^①因此，摈弃门户之见、避免内部循环、扩充研究队伍成为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实证意义（EITM）^②等主旨，计量研究与数理研究、政治学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在主动探索如何强化彼此间的学术探讨与合作。^③

七、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发展历程是多个要素作用下的产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在演进及其方法论变迁、日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生态、学者个人的偏好及其群体特征。回顾日本的国际关系发展史可以发现，其受欧美学界的影响固然有目共睹，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包含或从属的关系，例如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美式论争在日本几乎没有掀起波澜，而在包括定量研究在内的方法论层面，日本学界也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点。当然，正如山影进所强调的，这种“对抗性知识”的表现绝非“知识的国粹主义”。^④

重视定量方法并不等同于“技术先行”或“方法至上”，反过来，强调方法的“工具理性”也并不意味着忽视其可能的理论贡献。数理模型不仅需要和能够简洁地描述复杂的政治现象，也不乏规范意义。^⑤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在战后日本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课题解决志向”与“科学志向”等两种路径和偏好始终交织在一起。前者重视对现实政治的解读和判断，后者更强调从知识兴趣出发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⑥但“明确分析框架、凝练焦点、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与研究是否遵循“科学志向”并无本质联系，

^① 酒井大輔「独立することと孤立すること—共同研究をつなぐ場所と人—」、『現代思想』第48卷第14号、2020年、172—181頁。

^② 福元健太郎「政治学における計量と数理の統合の試み」、『数理科学』第62卷第4号、2024年、39—46頁。

^③ 計量・数理政治学会、<https://sites.google.com/view/jsqps>[2025-06-15]。

^④ 山影進「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研究の100年」、国際法学会編『日本と国際法の100年』(第1巻)、三省堂、2001年、261—289頁。

^⑤ 浅古泰史「理論的貢献と実証的貢献のトレードオフ—数理政治学の視点から—」、『公共選択』第67号、2017年、66—84頁。

^⑥ 待鳥聰史「戦後日本の政治学は何に关心を示してきたのか—日本政治学会パネル名称のテキスト分析による試論—」、『法学論叢』第193卷第5号、2023年、97—118頁。

因为这本就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① “开放、包容、多元”不仅是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要求，也应体现在研究的路径、方法和技巧之中。^②

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之外，不少日本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亦有探索，努力超越前述“理论与实证”之间的“分居状态”。^③ 但问题在于，在“全球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讨论日本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或“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美式政治科学特别是定量研究，而新的话语建构又时常“回到未来”，重归政治哲学或试图寻找先贤的既往理论阐释。^④ 因此，定性和定量研究者之间的真正对话还亟待深入。与此同时，技术的迭代又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持续地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对于文本、影像、音频、视频等数据的定量处理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⑤ 相关应用工具的不断涌现也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面貌。

定量研究多与“科学”相提并论，但“政治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称为“科学”，仍是一个开放性命题。^⑥ 如果把政治学视为科学，那么战后日本的政治学史亦可视为一种“科学史”。^⑦ 类似的判断或许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学。回顾日本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传承与嬗变，既是在学科史和学术史视角下的“清点库存”，更是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争辩在今后的建设性延续。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待鳥聰史「現代政治分析へのオルタナティヴとその困難さ」、『レヴァイアサン』第 45 号、2009 年、177—180 頁。

② 贺平：《欧洲日本研究的开放、流动与融合——对 EAJS 的知识社会学考察》，《日本学刊》2024 年第 6 期，第 126—154 頁。

③ 川崎剛『社会科学としての日本外交研究』、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 年。

④ 参见：葛谷彩・小川浩之・西村邦行編著『歴史のなかの国際秩序観—「アメリカの社会科学」を超えて—』、晃洋書房、2017 年；初瀬龍平・戸田真紀子・松田哲・市川ひろみ編『国際関係論の生成と展開—日本の先達との対話—』；葛谷彩・芝崎厚士編『「国際政治学」は終わったのか—日本からの応答—』、ナカニシヤ出版、2018 年；芝崎厚士『グローバル関係の思想史—万有連関の世界認識研究へ—』、晃洋書房、2024 年。

⑤ 参见：福元健太郎「政治学における人工知能の応用へ向けて」、『人工知能』第 35 卷第 4 号、2020 年、526—533 頁；西川賢『社会科学研究者のためのデジタル研究ツール活用術—アプリ・デバイスから生成 AIまで、生産性をあげるアカデミック・ライフハッカー』、弘文堂、2024 年。

⑥ 内田融「ポリティカル・『サイエンス』?」、『UP』第 32 卷第 3 号、2003 年、1—7 頁。

⑦ 酒井大輔『日本政治学史—丸山真男からジェンダー論、実験政治学まで—』、中央公論新社、2024 年、257 頁。

confidence and in elevating Japan's national image abroad.

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e Perceptions: A Study of Japanese "Generation Z" Youths'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Tian Kai and Zhang Jiaming

The persistent lack of favorable sentiment toward China among the Japanese public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phenomen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ddressing this issue remains a pressing challenge for foster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Surveys conducted in Japan indicate that levels of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rise as respondents' age decreases, with younger cohorts—particularly "Generation Z"—displaying relatively stronger feelings of affinity toward China. Having grown up in the post-bubble era of relative economic stagnation, Japan's "Generation Z" has not experienced the psychological disillusion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This cohor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mbrace of individualism and a general detachment from political issue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hibiting a generational propensity for engagement with mobile internet platform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nectivity, some politically indifferent members of "Generation Z", while filtering out Sino-Japanese political disputes, are exposed through online and social media channels to Chin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dynamics are continually shaping circles of high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amo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youth. Recognizing and actively fostering this trend of improved perceptions within younger generations may represent a practical pathway toward gradually ameliorating Japanese society's overall attitude toward China.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He Ping and Huang Bei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has undergone four distinct stages—initiation,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deepening—each corresponding to a generational gradient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seminal works, alongside shifts in core research theme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Behind this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lie three key factors: the internal disciplinary logic and methodological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pan's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scholarly ec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lars, though their relative influence has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exemplary role of pivotal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eams, two-way channel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such as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journal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Although the Japa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ty has not experienced intense "great debates" or radical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is field, its sustained phases of reflection and its efforts to balanc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s" nevertheles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